



## 人民交通社推出暗黑系故事书《鸡皮疙瘩故事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译者黄天怡在推荐自己的最新译作《鸡皮疙瘩故事集》时这样介绍：“雪女、水怪、尸体、鬼魂……小朋友最喜欢的恐怖元素一应俱全！让你有点害怕但也不至于太害怕！特别适合心胸宽广、有着先进育儿理念的家长。”

这是一本没有昏头昏脑的王子或者多愁善感的公主的童话故事集，近日由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推出。曾获英国最负盛名的儿童图书大奖——红房子图书奖的英国知名少儿文学作家安吉拉·麦考利斯特，精心收集了世界各地50个民间怪奇故事，插画师马达莉娜·安德罗尼为这些故事配上了

明艳灵动、充满奇妙想象力的插画，形成了这本图文并茂的暗黑系故事集。

在“会说话的头骨”故事里，一位猎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个会说话的头骨，猎人问头骨“为什么会死在树下”，头骨回答“说话太多了”。猎人回村后，将“会说话的头骨”一事告诉了酋长，想要换到丰厚的赏金。然而，当他带着战士找到头骨时，头骨却不肯开口说话了。最后，猎人因为愚弄酋长，被砍下了脑袋，并丢在了头骨的旁边。头骨问他：“那么你又是怎么死在树下的呢？”猎人回答“话太多了”。

这些小故事既黑暗又治愈，带给读者一种细思极恐的小紧张，又有一种力量悄悄从心里生根发芽。通过阅读这本故事集，可以帮助读者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可以激发出我们内心遗忘已久的情感——恐惧、惊讶、崇拜，继而丰富人生。

(穆)

## ●业者论坛

○杜茂莉

2020年以来，全世界各行各业都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出版行业的图书版权贸易也难以独善其身。反观两年来的中外图书版权贸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疫情初期，大受影响。**2020年上半年，尤其是第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严重影响了各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图书版权贸易也未能幸免。例如，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拓展部主任俞慧涓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0年2月，凤凰集团版权输出和引进数量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超过50%。另外，由于各国都出现疫情，海外书店销量骤降，实物图书出口降至谷底。同时，由于无法见面商议，重点项目进程迟滞。国外出版行业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据德国书业协会主席卡琳·施密特-弗里德里希斯介绍，在4月中旬书店恢复营业之前，德国出版社的销售额下降了30.9%。一场突发的新冠疫情给中外图书行业带来了全面冲击，极大影响了图书版权贸易。

**疫情持续，云上沟通。**国内外出版社版权经理之间的沟通是日常性、常态化的，并且通常情况下，除了每年少数几次书展见面的机会以外，大多都是通过邮件、电话等方式进行沟通。疫情期间，这种常态化的日常沟通并未受到大的影响，相反，还有可能因为线下书展停办，见面机会减少，中外双方都更加重视这样的日常在线沟通，并且，版权人员想出了各种办法应对疫情的挑战。例如，将签署纸质合同改为电子签，寄送纸质样书改为以电子样书为主等等。因此，虽然疫情给版权人员的沟通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是版权信息传递仍然在常态化进行。

此外，版权贸易从业人员也在积极探索新的沟通方式。比如，受疫情影响，线下的国际书展停办，各主办方纷纷举办云书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吸引了众多参展商和观众，尤其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成效特别显著，大大减轻了疫情对中国版权贸易的影响。2020年9月第二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就是在“云”上举办的，效果显著。本次“云”书展共有来自9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家参展商参加，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6788项，同比增长13.2%，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意向和协议4395项，同比增长14.45%，达成引进意向和协议2393项，同比增长10.99%。相比之下，2019年举办的第二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相关数据如下：来自95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参展商，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5996项，同比增长5.6%。其中，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意向和协议3840项，同比增长6.37%，达成引进意向和协议2156项，同比增长4.26%。

对比两年BIBF的数据可以看到，2020年的“云”书展作为一次创新的版权贸易形式，以创新的沟通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项数字同比增幅甚至远超2019年的线下书展。另外，本次“云”书展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了1300多场活动，其中专业活动参加人数超过500万。参展国家和地区数也超过了往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达31个；新展商数量达200家，国际出版企业50强中有25家注册参展。此外，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出版行业展会，2020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几乎完全在线上举行，来自10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400家参展机构通过网络平台参加了这次书展，参展机构数量远低于2019年的104个国家的7500家参展商。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常态”。**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出版行业也在进一步探索应对之策，线上线下结合成为了版权贸易的“新常态”。

第二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就是采取线下展会为主、网上平台配套、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也成为全球疫情下首个恢复线上线下结合办展的重要大型国际书展，吸引了来自105个国家和地区的2200家参展商，参与国家和地区数量较上届增加了8个。线下实体参展约1600家，占71%，共达成各类成果7321项，增长7.9%。其中，达成的各类版权输出意向和协议4835项，增长率继续超过10%，引进意向和协议2486项，增长3.9%。可见，2021年虽然是首次尝试线上线下结合办展，但是成效依然喜人，尤其是版权输出增长迅速更加可喜。

同时，2021年法兰克福书展也采取了实体书展和线上内容相结合的形式，来自80个国家的2000家参展商到法兰克福现场参展，但是这一数据仍然远低于2019年104个国家的7500家参展商，甚至也低于2020年的数据。

可以看到，与往年相比，线上线下融合办展的方式便捷而有效，吸引了众多参展商和观众参与到书展中来，尤其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规模迅速恢复和增长。预计未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将成为书展的新常态，这一趋势即使在后疫情时代仍将延续。

除书展以外，版权经理们也在积极探索其他在线沟通方式，例如微信、视频/电话会议等，各种沟通方式齐上阵。“互联网+”时代为开创新的版权贸易方式提供了可能，有效弥补了疫情对图书版权贸易的影响。

综上可见，疫情下图书版权贸易的关键在于以国力为依托，以内容为先导。未来的图书版权贸易中，版权经理应继续用好已有的交流平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融合交流方式，不断拓展新的合作。同时，在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之下，考虑到面对面交流的难度和成本，交流的重点应该转移到线上，通过在线书展、社交网络、视频会议等进行实时沟通，打破地域限制，了解国外出版社的最新产品，同时及时高效的了解他们的需求，把出版社产品推介给国际同行，成功实现图书版权的引进和输出。

## 解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成功的奥秘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百年奋斗

○任建东

百年前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又为什么行？近读清华大学教授戴木才新著《一切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广东人民出版社），感受颇深。

作者独辟蹊径站在当代中国主客体相统一的新视角，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人民与政党、政党与国家的相互结合中，阐发了政党、国家、历史与个人、人民之间的命运关联，表现和论证了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源，为我们历史地、立体地、整体性地理解中华民族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恢宏视野。作者以翔实的史料、丰厚的文献和扎实的功底给我们展示了近代以来志士仁人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而不断奋斗的历史画卷，解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这一历史之谜。综其所论，该书凸显了三大主题。

一是坚定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核心竞争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唯物史观契合了先进的中国人那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从而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从此在中国落地生根。以“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共产党人的政治观，其核心要义就是一切为了人民”。

（该书第40页）立党为民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人民的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信仰。正是靠着这种坚定的信仰，才凝聚起党心民心，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信仰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竞争力”。（该书第72页）

二是民心所向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最强大力量。“民为邦本”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变的价值理念，群众观点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观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靠得民心取得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同样也得益于民心所向和人民群众的干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是最强的力量。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一户承包者的年粮食产量超过了过去一个村的总产量，顺应民心，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就发展顺利，一切都源于民心之向背。把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在首位，急民所急，为民所想，一切为了人民，人民就会赞成、拥护和支持。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月版  
88.00元

2020年

## 服务在云上

关键词 银行转型 数字经济 新金融模式

○王雪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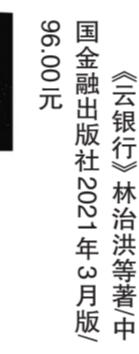
无处不在，无迹可寻。银行服务在云上。

云银行不是商业银行发展路上遇见的独行者，而是金融数字化转型大趋势下的必然产物。

由林治洪、罗勇著的《云银行》一书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两位作者均是金融行业的资深专家与领导者。其中，林治洪曾荣获中国金融工会授予的“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亚洲银行家》杂志“亚太及海湾地区50名最有前途的年轻银行家”等荣誉。罗勇基于银行数字化创新与科技系统研发创新，多次荣获人民银行科技发展奖：2013年二等奖、2016年三等奖、2019年二等奖；作为唯一金融机构代表荣获2020年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他们用平实优美的文字带着读者进入了云的世界。

这是一本有关数字经济时代下银行转型与变革方向的专业金融书籍。云银行是“行业云+金融云”商业新生态下产生的新金融模式，以SaaS化方式连接行业与金融。云银行本质上提供的依然是存款、贷款、支付、理财等传统服务，但是基于这些底层服务与技术的融合搭建了各种金融云，如支付云、贷款云、财富云与资管云。这些金融云可与外部各个行业SaaS平台进行连接、协同发展，辐射至各个细分场景，从而赋能生态，由此构建出基于“行业云+金融云”的一个数字生态系统。

云银行依托“分布式+大数据+金融云”三大科

国  
金融出  
版社  
2021年3月版

技基础的金融云平台聚合能力，构建纯线上化的“点、线、面、体”的数字化经营模式，即“聚合流量、聚合服务、聚合数据、沉浸链接”的数字化经营模式。

云银行有两大价值：一是数据价值。云银行所蕴含的云架构、云服务恰好为数据资产提供了更开放的共享空间，使数据能够在平台上自由流动，触达万物。云银行通过融合内外部数据，形成数据资产池，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能。二是财务价值。云银行的财务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升业绩、创造营收和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两个方面。云银行可以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感知客户需求，用数据做好经营管理的决策支持和客户体验的提升，发挥规模效应从而带来价值的指级数增长，并提升业绩，创造营收，大幅提高经济效益。

它将复杂的金融学主题加以分解，通过四篇内容循序渐进，加以多个案例，深入浅出地指出云银行这一创新的金融理念。同时，根据作者多年银行从业经验发现，对于银行的转型方向从来都是不清晰与不确定的，就如当前很多银行都在提数字化转型，但是何为数字化的战略不同银行有着不同的阐述。另外，不同层级的银行人对银行转型态度也不一样。作者指出由“听得见炮火

的人指挥战斗”，业务团队应负责围绕用户不同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

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背景下积极探索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新路径的著作。书中以“四大定律”与“三大效应”为理论基石，阐述了在传统产业云化趋势下银行融合金融科技的必然趋势，指出云银行出现的必然性。同时，这本书向读者阐述了云银行利用科技搭建如支付云、贷款云、财富云与资管云等金融云，并与行业SaaS平台连接，覆盖各类支付、数据等场景，并全方位开放金融、技术、数据、风控、营销等领域。云银行通过新金融范式，形成“云客”“云数据”“云服务”内在运营机制，利用技术体系、生态体系和组织体系三大体系融合形成商业新动能，聚焦云旅程，优化云客体验，以“极致体验”发掘“极致价值”，推动云银行数字化发展。

该书作者结合多年银行工作经验和对于金融机构变革的睿智善思，首次提出云银行这一创新金融理念。其走访多家国内外不同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了解并总结出他们对于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期望，为云银行奠定了实践基础。同时，结合自身带领团队创新研发交易银行、直销银行、生态金融等平台与产品的实战经验，为银行数字化转型提出独到见解与建议，为商业银行数字化创新提供借鉴。

##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关键词 音乐史 民族音乐学 田野工作

○陈 烨

杜亚雄的《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核心是在高厚永教授指导下完成的一篇硕士论文。1980年，高教授将民族音乐学引进我国，这篇论文是我国民族音乐学家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的首篇论文。1981年，其初稿在《甘肃民族研究》创刊号上发表后，美国、日本、加拿大、匈牙利和阿根廷的报刊予以报道，产生了深远影响。

采风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础。该论文成功的基础是在采风中得到的丰富材料。杜亚雄从1964年开始在裕固族地区采风，十多年中，他不仅学会了裕固语，记录了200多首民歌，还放弃了毕业后留在兰州的机会，去嘉峪关工作。当时，草原条件艰苦，晚上无住处，他便睡在羊圈里。他研究裕固族民歌的热情和努力感动了裕固族歌手，他们对他的工作都非常支持，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该论文的成功还得益于杜先生在研究民歌时的多维度视角。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应将音乐的概念、行为和声音都放在“历史构成（时间）”“社会维持（群体）”“个人创造和体验（个体）”三个维度中加以考察，从而获得对音乐文化与其他

年3月第1版  
9.00元  
精  
装

文化事项间关系的认知。在此文中，杜先生正是因循这一视角，以“裕固族民歌中保存着许多古代回鹘民歌的特点”为假设，展开了论证。

历史、语言及民族学研究成果已经证实裕固族作为古回鹘、突厥的后裔，较好地保存了古代文化，所以提出上述假设就是将裕固族民歌放到“历史构成”和“社会维持”的维度进行思考的结果。论证从民歌在裕固族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歌词的格律、音韵和表现手法，民歌的源流和发展，民歌的音乐特色四个方面进行。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充分运用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式。例如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的理论，推导出判断民歌保留古代特征程度的依据是：与古代相仿佛的生产、生活方式联系越紧密的民歌，保留的古代特征越多。这显然是在“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两个维度交织下形成的总结。又如，他探索了裕固语重音和民歌中前短后长的节奏型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支柱音、半支柱音构成的四度—五度框架填充来说明裕固族民歌调式音阶。这是他站在“个人体验和创造”的视角对音乐本体作出的判断和陈述。又如，他在分析一些裕固族民歌因受汉族民歌影响而产生变化时提到，老百姓不但接受这种汉族化的改编，并因此而产生出了新的审美趣味。他用“社会维持”和“个人创造”两个维度思考裕固族民歌的传承和发展，提出为避免古老的音乐特征失传，“搜集整理工作更需抓紧”的建议。

论文最后一章通过比较研究，证实了假设，将裕固族民歌中古代特征形成时间推移到匈奴离开我国北方草原（公元91年）之前，解释了形成“民族的血缘关系和民歌的相似程度成反比”以及“居住地区的距离和民歌的相似程度也成反比”这两个奇特现象的成因。同时也指出了民族音乐学大师柯达伊在论证匈牙利民歌渊源方面出现的问题。

1980年代就敢质疑世界性权威的底气来自长期、细致的田野工作，也源自对研究对象的感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因为对裕固族民歌充满感情，杜先生才能不为眼前的利益所动，几十年如一日地做踏实的田野工作，才能克服种种困难，从多个维度出发，找到最有价值的视角，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学术观点。

这篇论文在我国音乐史上具有开拓性，应成为后学的“范式”。此次出版，书中收录了杜先生多年跟踪研究裕固族西部民歌的多篇研究成果，值得向大家推荐。